

红旗

HONGQI

5

一九六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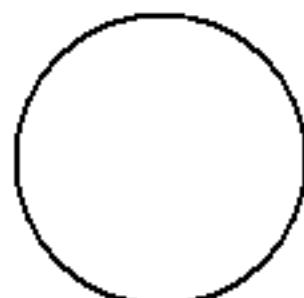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六一年第五期★

目 录



社論：在学术研究中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劳动力问题……………馬文瑞 (6)

阿尔巴尼亚人民胜利的斗争……………罗士高 (17)

調查研究的态度……………关 鋒 (22)

民主革命中的农民问题……………林一舟 (27)



社論



在学术研究中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中，提出問題，发表不同意見，进行自由討論的風气有了发展，这是一种很好的現象。在各种問題上进行的討論，有些比較深入，有些还只是初步接触；討論的結果，有些已經取得了結論，有些还未能达到結論。不管怎样，在任何一个学科中，有了爭論，有了相互交換意見，相互批評，就有了活跃的空气。这种活跃的空气对于科学的发展，对于科学工作者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对于青年一代的科学工作者的成长，是极为有益的，是十分必要的。

我們党坚持在学术和文艺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毛澤东同志在說明这个方針时会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种風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風格，另一种学派，我們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問題，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討論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决。”^①无数的事实証明，为了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就必须实行这样的方針，而决不能实行与此相反的方針。

科学的任务是探求客观真理，真理是有客观标准的。有許多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否认真理的客观性，照他們看来，真理是因人而异的，只要“言之成理”，就算真理。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认为，科学上的是非不决定于主观上是否“言之成理”，而决定于是否符合于实际。在任何一个科学問題上，不能同时有几个客观真理，而只有一个客观真理。但同时，我們又认为，使我們的主观認識达到客观真理，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当客观的科学真理还没有为我們掌握的时候，就必须容許人們从各种不同方面經過各个不同途徑进行探索，进行各种不同的試驗，提出各种不同的假說，并且进行自由爭論。这样，我們就能够一步步地接近客观真理。我們主張在学术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基本上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的。

资产阶级唯心論者把真理看做主观杜撰的东西，是为了掩护那些違反客观实际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現代资产阶级承认不同学派的存在，实际上只是承认符合于反人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5—26 頁。



民群众的、反科学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哲学、社会学的观点和对他们有利的各种自然科学学说。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则是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律，按照有利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原则来促进科学工作，以求不断地更多认识客观真理。

科学工作不能只是复述前人已经达到的成绩，重要的是要在接受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过独立的工作，解决前人所未有解决或者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进入前人所未有进入或者没有完全征服的领域。在解决新的问题和征服新的领域的过程中，难免要经过曲折迂回的道路，错误也是可能发生的。如果为了怕犯错误而不敢接触新的问题和新的领域，就不会有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在科学的发展中，会不断地遇到新的问题；不应当认为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都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而要勇敢地向新的领域探索，容许人们由于进行新的探索而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同时，我们的科学工作当然也不应当停滞在还不成熟、还不是完全正确的，以至错误的意见上，而要造成一种条件，使正确的意见能够起而代替错误的意见，使完备的结论能够起而代替比较不完备的结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符合于这样的要求的。

在科学研究中，对于比较复杂的对象，为了求得完全的认识，往往需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去处理。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整体，整个社会也是一个整体。对自然界的整体和社会的整体中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分别地进行研究，就有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个学科。如果不是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我们就不可能对自然界和社会得到完整的知识。在不同学科之间，当然不应当尊此贱彼，互相排斥，而应当共同发展，互相支持。在社会主义的有计划进行的科学事业中，应当使所有的学科的研究工作都有适当的安排。在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中，有些同当前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主义事业较少或很少直接联系的学科，被人认为冷门；但只要它们对于作为整体的自然和社会的研究也从某一个方面有所贡献，那么在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安排中也应当有它们的适当的地位。这也是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的要求。从不同的学科的研究出发，对于共同有关的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进行讨论，也是必要的。这种讨论对于从事这些不同学科的人来说，都有扩大眼界的作用。通过这种讨论，可以互相吸收正确的意见，取长补短，可以使由于某一学科的局部范围而有时难免形成的某种片面性得到克服，并且使问题得到比较全面的解决。

在同一学科中的不同学派，一般说来，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在不同学派之间，有的学派是正确的或基本上是正确的，而别的学派是错误的或基本上是错误的。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学派和唯心主义学派的对立就是正确和错误的对立。在这种不同学派之间，应当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来辨明谁是谁非。站在正确方面的学派应当在同错误作斗争中克服错误的主张，发展正确的主张，也要吸取对方所提供的某些有用的思想材料。另一种情形是，不同的学派分别在不同的条件下，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同一的对象，在它们之间，并不是正确



和錯誤的对立,它們在不同方面对于探求真理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中医和西医的區別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这种情形。它們在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的同时,也可能各有某种片面性和缺陷。它們之間,在个别問題上也会有是非的爭論,但总的說来,这种性质的不同学派完全可以共同发展,互相帮助。在科学史上,这种性质的不同学派发展的結果,并不是这一个学派克服了那一个学派,而是在各个学派所提出的积极貢獻的基础上,使科学的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

在資產階級学术界中,“門戶之見”不但存在于各个学派之間,而且往往还存在于各个学科之間。某一学科的研究本来只是以自然現象中的某一方面,某一部門为对象,但有些研究者却竭力夸大这一学科的重要性,企图使其他学科服从这一学科,自以为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已經可以解答自然界的全部奧秘。从这种不切实际的夸大中只能得到荒謬的結論。某一学派本来只是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对它的研究对象做了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結論,但如果企图壟断这一方面的研究,不准許別人从其他方面,其他角度进行研究,不承认別人的研究也有自己的貢獻,那就不仅是不利于这門科学的发展,也会不利于这一学派的发展。資產階級的錯誤的唯心主义的哲学、社会学的学派或其他坚持錯誤主張的学派取得了壟断地位,那就更加是有害于科学的发展了。我們所要执行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是同这种資產階級学术界中的反科学的“門戶之見”相对立的。

我們的科学工作的目的不仅在于認識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对客观事物的認識有正确有錯誤,有深有淺。在改造客观事物的實踐中所采取的方法也有正确有錯誤,有好有差。在如何改造客观世界的問題上,特別表现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当然,只有在科学地認識了客观規律的基础上,才能在實踐中达到預期的目的。但是也常有这种情形,为了达到預期的某一目的,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也可以采用那样的方法。两种或更多种的方法虽然都有某种客观規律性的依据,但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因为是建立在对外观規律性的更深的認識的基础上,因为是更充分地利用了有关的各种客观規律性,所以比別的方法更好更有利。在科学技术上常常可以遇到这种情形,在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設問題上也有这种情形。提倡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科学的力量来改进我們的實踐,不让我們的實踐停滯在已經达到的水平上面。

以上这些都表明,在我們的科学事业中,应当有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广闊的天地。如果以为承认客观真理就不能提倡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那显然是錯誤的。

由此也可見,我們承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即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我們的各門科学研究中都起着指导作用,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不应当和不需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馬克思列宁主义使哲学、社会科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哲学、社会科学的領域內,人們如果不是自觉地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上和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那就几乎不可能真正解决任何一个实质性的問題。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正确性也在自然現象的科学研究中得到証明。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領域內，研究者如果能够自觉地运用辨証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也一定能够大大地促进自己的工作。承认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門科学中的这种指导作用的人，在我們的学术界中已經一天天更多了。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代替每一門具体科学的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基本理論和方法，依靠这种理論和方法，科学研究工作者还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大量地收集材料，独立地进行思考，才能在某一个具体問題的科学研究中得到成績。恩格斯說得好：“即令只要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挥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种需要多年靜心研究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讲空話是无济于事的，这样的任务只有依靠大量的、經過批判审查了的、完全领会了的历史材料才可解决。”^①

因此，我們不能以为，只要有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追求科学真理就是輕而易举的事，就不会經過曲折和艰难，就能保証不出任何差錯，就不需要有任何不同意見的自由爭論。同时，我們也不能以为，简单地背誦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某些原則，就能判断科学爭論中的是非問題。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科学性和高度革命性相結合的理論。必須联系具体实际，全面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才能发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力。如果任意摘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則、个别語句，而不对具体問題进行具体分析，就来判定什么意見对，什么意見錯誤，这种判断一定是靠不住的，而这样的做法往往只是使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一种片面性的东西。

承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并不等于已經能够正确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人們要想熟练地掌握某种武器，就必须反复地使用它。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武器也是这样。研究具体科学問題，进行自由而充分的討論，这就能够真正看出究竟是否已經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論和方法彻底决裂，是否正确地理解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方法，是否在所研究的問題上已經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并且能够使理論和实际相結合。所以百家爭鳴正是为学术界提高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提供了一种条件。有些从旧社会来的知識分子，虽然在思想上經過自我改造，承认和接受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但是一到具体的学术問題上，他們的旧的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的观点又会流露出来。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有些爭論，只是由于某些人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方法的理解和运用不正确而引起的，但是，就是这样的討論，也是有意义的。在努力学习把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具体科学研究中去的过程中，发生差錯是难免的，对于这种差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不能熟視无睹，但是这种差錯同反对和有意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区别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不是简单地斥責这种差錯，

^① 《論卡尔·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347頁。



而是認真地進行討論，有說服力地糾正這種或那種不正確的理解。

在政治上承認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一件事；在學術上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是另一件事。這兩件事顯然是互相有關的，但又並不就是同一件事。有這樣的人，在政治上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在學術上仍然懷疑馬克思列寧主義，例如，有這樣的自然科學家，他們在學術理論上仍然受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束縛，看不到這種世界觀同實際科學工作之間的矛盾，他們不知道，即使是不承認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科學家，如果能夠在科學研究上真正做出成績來，就不能不是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自發地傾向於唯物論，並且在某種程度內傾向於辯證法。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當團結一切在政治上承認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的學術工作者，並且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下同他們一起為我們的科學事業的發展而努力。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當然不否認和排斥一切還不能自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的科學家所作出的科學成績，而要通过自由的討論來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對於各個學科的研究工作所具有的指導意義。許多從舊社會來的學術工作者在政治上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因為已經有無可辯駁的鮮明事實說服了他們；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學術上真正確立指導地位，就必須依靠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學術上做更多的工作，在學術的討論和批評中起積極的作用。

在我們的社会中，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不但在學術問題上，而且在政治上，企圖用資產階級的理論和方法來代替無產階級的理論和方法的人當然還是有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固然也會被他們所利用，但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不因此而害怕實行這個方針。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害怕任何人批評。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在人們的批評中間，就是要在鬥爭的風雨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擴大自己的陣地。”^①

毛澤東同志在說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時還說：“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批評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着錯誤思想到處泛濫，任憑它們去占領市場，當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評，有毒草就得進行鬥爭。但是這種批評不應當是教條主義的，不應當用形而上學方法，應當力求用辯證方法。要有科學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說服力。教條主義的批評不能解決問題。我們是反對一切毒草的，但是我們必須謹慎地辨別什麼是真的毒草，什麼是真的香花。我們要同群眾一起來學會謹慎地辨別香花和毒草，並且一起來用正確的方法同毒草作鬥爭。”^②

由此可見，對我們說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發展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科學事業的一個積極的方針，是不斷地鞏固和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學術界中的領導地位的一個方針，是充分表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性的一個方針。我們的學術界應當繼續貫徹執行這種方針，共同為我國的科學事業的繁榮發展而努力。

①②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9頁。



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劳动力問題

馬文瑞

我国劳动力的状况和劳动者的面貌，在国民經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計划时期，同旧社会比起来，已經有了根本的不同，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又进一步地起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三年中，随着生产建設的高速度发展，我国国营工业、交通运输、商业、文教卫生等部門的职工总数增加了大約一倍，其中工业工程技术人员增长了一倍多，新成长的技术工人有几百万人；另外，还有一大批劳动力参加了城市人民公社組織的各种生产劳动和服务工作。在农村中，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巩固，农业“八字宪法”的推行，大規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設的兴办，林、牧、副、漁、社办工业和农村其他各項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农村中广大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三年来，由于生产持續跃进，劳动报酬增长和就业人数增多，劳动者的家庭收入不断增加。劳动者的思想觉悟和組織程度，也大大提高了。

在这偉大的三年中，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随着我国国民經济的迅速发展与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巩固，在我国社会中，已經根

本消除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城市中的失业現象和农村中的所謂“人口过剩”現象。几千万长期羈絆在家庭瑣事中的妇女，欢欣地参加了社会劳动。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已經走上了合适的工作或者学习的崗位。“人人有事做”的理想在我国已經完全实现，我国从此将永远是一个充分就业的社会。

我国几亿人民充分就业、热爱和平劳动、生活不断改善的铁的事实，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一些資产阶级学者的所謂“中国人口多，无法解决就业問題”、“中国人口多，无法提高生活水平”以及“中国人口多，必然要向外扩张”的种种謬論和誹謗。

同帝国主义者和他們的应声虫的主观願望相反，在我国社会中出現的問題，已經不是什么劳动力过剩問題，劳动者失业問題，而是劳动力由多余变为不足的問題。这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在彻底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的失业問題、实现了充分就业之后出現的新問題。

毛澤东同志早在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剛要到来的时候就預言說：“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問題。在合作化以后，許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



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过去，人们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会过剩。原来已经过剩了，再来一个过剩，怎么办呢！在许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人们的这种顾虑，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在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①三年大跃进的实践，完全证明毛泽东同志的预言的正确，证明这个预言是充分认识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作出的科学论断。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持续跃进中，在劳动力方面感到某种程度的不足，是一种正常的情况，是一件大好事，归根到底是我国生产建设发展的结果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标志。

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们那里出现的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在资本主义世界，由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尖锐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愈来愈深刻化。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为了维持它们的高额利润，愈来愈横暴地加重了对劳动者的剥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战前，并且还在继续降低。在那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存在着数

以几十万、几百万计的庞大的失业人口。帝国主义的头子、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一九六〇年有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五家公司倒闭，企业倒闭率达到“二十年来的最高峰”（据《邓—布列德斯特里统计所》报告，见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华尔街日报》）。美国总统肯尼迪今年二月十五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美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失业人口已经达到了五百五十多万人。

在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生产不断增长，失业现象消灭，劳动者的家庭收入不断增加，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而在资本主义世界，则是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不断下降，显露出满天阴霾的垂暮景况。这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所谓“自由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二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出现的劳动力由多余变为不足的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对劳动力的需要，对于保证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一般说来，要靠以下两个途径：一是提高生产的机械化程

^① 《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的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4—675页。



度，用机器来代替人力；一是合理安排和节约使用劳动力，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单位，按照生产建设任务保有数量适当的劳动力，避免使用劳动力畸多畸少和一切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充分发挥每一个劳动力的作用。

不断地提高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根本措施。大跃进以来，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大大地加速了我国生产机械化的进程，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依靠提高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还受着客观条件的较多限制。我国当前的情况是，在农业上一般地还是手工劳动，在工业中，有些部门或者有些企业，手工劳动所占的比重也很大。在使用手工劳动的地方，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争取采用新工具、新机器、新技术来节省人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潜力当然是很大的。但是，当目前在这些部门和企业中还没有条件用现代化机械来装备，还不能不保持大量手工劳动的情况下，要很多地节省人力和很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从合理安排和节约使用劳动力方面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就更显得十分重要。

我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我们有可能来合理安排和节约使用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在企业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竭力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

从而造成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劳动力不可能全面安排和合理使用，因而，从整个社会来说，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国民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我们完全能够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根据国家当前的建设方针和任务，按照统筹兼顾的精神，对于农业、工业等国民经济各部门需要使用和可能获得的劳动力，进行全面安排，合理分配，以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的需要。

节约使用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可能范围内用最少的人力实现最大的增产，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说过：“无论个人，无论社会，其发展、需求和活动的全面性，都是由节约时间决定的。一切节省，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省。……因此，节约时间以及在各个生产部门中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就成了以集体生产为基础的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是极其高级的规律。”^①列宁特别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意义，他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②；“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根本的任务，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

①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一《货币论》。转引自《论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

② 《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8页。



地过渡到共产主义。”^①毛澤东同志一贯重视节约人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总是把节约人力提在前边，他一再告诫我们：“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②；“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③；“十分注意人力物力的节省使用”^④；“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⑤物资的节约是节约物化劳动，人力的节约是节约活劳动。活劳动是创造财富之源，因此，节约人力是尤其重要的，是最根本的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人力物力，是我们发展生产的根本性的措施。在我国工业、农业等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都应当注意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具备着发展国民经济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一定能够在我們加速提高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合理安排农业、工业等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劳动力，和注意劳动力的节约使用下，获得很好的解决。

三

按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党的方针政策，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这就要

求在劳动力的安排和使用方面，根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精神，尽可能满足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使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从而促进重工业的迅速发展。

馬克思曾經論述过农业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說：“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⑥他又說：“能够投于工商业上面而无須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人数……是取决于农业劳动者在他们自身的消费額以外，能够生产多少的农产物。”^⑦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是互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經不断地促使农民破产，加深农业的危机，但是，它同时却不能不以农业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其先决条件。这是一个不以人們意志为轉移的客观经济規律。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是紧密結合的。我們应当自觉地利用国民

- ① 《俄共(布)党綱草案》。《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0頁。
- ② 《必須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19頁。
- ③ 《論联合政府》。《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2頁。
- ④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針》。《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74頁。
- ⑤ 《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費用的經驗》一文的按語。《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8頁。
- ⑥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25頁。
- ⑦ 《剩余价值学說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頁。



经济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这一客观规律，大力加强农业战线，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发展，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

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从来都特别强调地指出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红色区域，“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①。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经常地告诉全党要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要使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互相适应。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地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③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毛泽东同志又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地提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毛泽东同志以上的思想，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我国当前的生产建设，是按照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进行安排的。劳动力的安排是生产建设安排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生产建设的安排如此，劳动力的安排当然也必须如此。

我国劳动力的分配使用，特别着重安排好农业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这也是从我国当前农业的实际情况出发所必须采取的重要措施。当前我国农业战线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巩固，为农业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农业“八字宪法”的推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兴办，林、牧、副、渔、社办工业、商业和农村运输等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大大增加了用工量，此外，生活服务、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开展，也要占用一定的劳动力；而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农业机械化还仅仅在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依靠手工劳动。要依靠手工劳动来满足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而大量增加的用工量，当然不能不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特别是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需要更多的人力来进行抗灾斗争，劳动力紧张的情况就更显突出。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根本办法，是实现农业机械化，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目前这个工作正在党的领导下，在工业和其他各行各业的大力支援下，加紧地在逐步进行。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如此广大，实现农业机械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增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

- ① 《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26页。
- ②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4页。
-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页。



力，就成为农业增产，首先是粮食增产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并不是一种暂时性的措施，而是在今后相当年份内必须坚持做好的工作。

在目前说来，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必须做到以下三条。

第一，保证农村中的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达到农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争取达到百分之四十。这是正确分配城乡之间、也就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劳动力的重要标志，是保证农业战线有足够的劳动力的先决条件。我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要“逐步把一个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移到工业方面”^①。这个转移应当是逐步的，并且是数量适当的。实现这种转移的根本条件，是农业生产向机械化过渡，用机器来不断地代替人力。在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基本上仍然是依靠人力的条件下，要过多过快地使农村人口转到城市，是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并且归根到底也不利于工业的发展的。规定农村中的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必须达到农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或者百分之四十，以限制城市从农村抽调劳动力，并且进而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动员城市中可以调出的一部分劳动力下乡，确保农业战线有充足的劳动力，这在当前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保证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固定归生产小队支配。这不仅是确保农业生产所必需，并且也是贯彻执行人民公社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生产小队是人民公社组织生

产的基层单位。农业生产的好坏，取决于全国三百多万个生产小队的劳动成果。保证小队有支配劳动力的必要的权力，是发挥小队的劳动主动性、积极性，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劳动力固定归小队支配的规定，必须坚决执行。

第三，保证在农忙季节使农村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用在农业生产第一线。这是正确分配农村中农业和非农业各方面的劳动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争取农业有好收成的重要条件。农业生产大大发展了，其他生产建设事业也就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既然目前农业生产主要还是依靠人力，而农业“八字宪法”的进一步实施又要求增加田间的用工量，因此，必须保证在农忙季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力用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才有可能取得好收成，首先是粮食的好收成。

以上三条，是完全合乎客观实际的要求。自从一九六〇年秋天党中央发出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以来，在许多农村人民公社中已经实现了这些要求。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三条要求，应当采取一些什么办法呢？

最主要的也是最易见效的，是在农村人民公社内部调整劳动力。农村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它除了发展农业生产以外，还要

^①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页。



相应地发展多种经营和其他各项事业。但是，任何事业的发展，总有轻重缓急之分。当前农村人民公社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生产。其他各行各业都应该在同农业紧密结合、在促进农业生产和在农业的带动下去进行。这就要求在劳动力的分配上坚决保证满足农业生产第一线的需要，把非农业各方面占用多了的劳动力调整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来。一九六〇年秋天以来，从各方面调整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已经有两千多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从农村人民公社内部调整的。但是，有些地方非农业各方面占用的劳动力，在数量上、质量上还过多过强，而给农业生产第一线配置的劳动力仍然偏少偏弱。因此，必须要作进一步的调整，继续挖掘非农业各方面的劳动力的潜力，采取抽调、以弱替强等办法，把更多的、强的劳动力调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人民公社各项事业，除了一部分必须维持常年工作的以外，一般的都必须同农业生产季节相结合，农闲多办，农忙少办，大忙停办，农忙务农，农闲做工或者从事其他经营。非农业各方面所用的劳动力，在农忙季节必须控制在人民公社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内，在农闲季节可以适当增多一些。

除了从农村内部调整以外，城市各行各业也应当尽可能从劳动力方面支援农业，抽调一批干部、技术工人和一般劳动力，到农村去加强基层工作、帮助农业技术改造和直接参加农业劳动。这些工作，一九六〇年冬季以来，已经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目前应该继

续努力，按照预定的计划，把企业、事业、机关中可以抽调出的一部分劳动力，及早下放到农村去。

四

在工业战线上的劳动力，当前总的说来并不是数量不足的问题，而是合理调整和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的问题。

在大跃进的三年中，我国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他们的操作技术更加熟练，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大大加强。这些都为我国工业战线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节省人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并且，三年中我国工业战线上的职工人数已经增加了一倍多。就很多企业来说，目前不是人少了，而是人多了。因此，只要我们在所有企业中，进一步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改进劳动组织和定员定额，努力挖掘生产潜力，我们就可以依靠现有的劳动力，保证生产建设事业继续发展的需要。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我国当前工业战线的方针和任务。全会公报指出：“重工业方面，由于三年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即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原定的水平，一九六一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这就是说，应当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种，加强生产中的薄弱环节，继续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节约原材料，



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党中央确定的方针任务，在劳动力问题上，应当采取措施，压缩基本建设方面使用的劳动力，发掘一切企业中现有劳动力的潜力，节约劳动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做到增产不增人，甚至增产又减人，并且尽可能抽出一部分劳动力，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

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是高速度的扩大再生产，因而必须重视发展基本建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发展基本建设必须同发展当前生产相适应，必须以当前生产为基础。如果在基本建设方面分散了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前生产，就会对扩大再生产不利。三年的连续大跃进，我国的工业基本建设方面有了巨大的发展。当前工业基本建设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从各个工业部门和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设备能力的现状出发，进行填平补齐，配套成龙，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使基本建设更好地同当前生产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使现有基本建设力量得到更好的利用，并且从基本建设中节约出一部分劳动力，充实现有生产企业和支援农业。在安排基本建设劳动力的时候，还必须首先满足生产性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其次才是非生产性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

在现有生产企业中，节约劳动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潜力。大跃进三年来，在工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少企业在使用劳动力方面，曾经产生计划不周的缺点。有的企业，特别是新建的企业，用人过多或者过早；有的企业非直接生产人员和辅助工人的

比重较大；有的企业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同当前生产结合得不够紧密，或者对技术革新的成果，没有及时巩固和迅速推广；有的企业在技术革新获得重大成就，生产迅速发展情况下，管理工作没有及时跟上来，劳动组织不能完全相适应，等等。这些缺点，都不利于劳动力的节约和劳动生产率的更大提高。迅速克服这些缺点，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根据当前的情况，所有企业都应当适当地精简机构和人员，进行余缺调剂，充实生产第一线，加强基层领导，保证重点企业和新建企业必须补充的劳动力，同时尽可能地支援农业。在生产人员和非直接生产人员之间，主要生产工人和辅助工人之间，应当保持一定的比例，当前一般要扩大前者的比重，压缩后者的比重。一切革新活动必须同生产紧密结合。凡是经过科学鉴定可以推广的新技术、新工艺，要纳入生产计划和技术操作规程，迅速地采用和推广。各企业要随着生产的发展，及时地改善管理制度，整顿劳动组织，改进定额员，重视产品质量，注意生产安全和劳逸结合。企业的领导人员，要树立坚固的节约劳动力的观念，克服片面地以为“人多好办事”、粗打冒算、用人宁多毋少、宁早毋迟等不正确的想法和作法；树立坚固的全面观点，克服片面地强调本单位的需要和方便的本位观念。千方百计地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争取用尽可能少的劳动，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作出尽可能好的成绩，是现有企业重大而光荣的任务。

根据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在工业



内部，存在着人力调整问题。在工业中，采掘和冶炼、加工，修理和制造，配套产品的生产和主机的生产，厂矿运输和生产等方面，都必须互相适应，在劳动力分配上必须进行统一安排，那一方面劳动力缺乏，就应当加强那一方面的劳动力的配置。从当前情况来看，一般说来，在矿山采掘、维修配套、厂矿运输等方面，是比较薄弱的，应当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给这些方面适当地增加人力。特别对于有些对国民经济十分重要而手工劳动还比较多的部门，如矿山采掘、森林采伐等，必须在加强技术改造的同时，保证充分的人力。但是，加强上述若干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的配置，一般应当采取从工业、基本建设等部门现有职工中调整的办法来解决。

在工业中的“小土群”、“小洋群”企业，比现代化企业占用的劳动力一般要多一些，有的多得多，劳动生产率一般要低一些，有的低得多。因此必须进行整顿和提高的工作。这些企业现在一般技术比较落后，手工劳动的比重较大，它们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很大。在这些企业中积极进行技术改造，改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十分必要的。经过技术改造，现在某些先进的“小洋群”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接近和达到现代化企业的水平。在三年的大跃进中，“小土群”、“小洋群”在发展工业生产，促进工业的合理布局和支援农业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目前，在工业中克服薄弱环节、进行填平补齐的工作中，在工业支援农业进行技术改造中，“小土群”、“小洋群”仍然要起它的作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并举，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两

条腿走路”方针的重要内容，而“两条腿走路”是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重要的方针。因此，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小土群”、“小洋群”企业，也应当在精简的原则下保持必要数量的劳动力。

为了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重视培养后备技术工人。有计划地培养后备技术工人，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大家知道，在旧中国时代，我国技术工人的人数是很少的。全国解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在大跃进的推动下，我国技术工人的人数迅速增加，技术水平空前提高，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但是，按照发展生产建设的需要，现在我们仍然感到技术工人不足。因此，必须加紧有计划地培养后备技术工人，为今后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培养后备技术工人应当继续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是既采取分散的以师带徒的培养办法，又采取集中的在技工学校中培养的办法。应当提高培养后备技术工人工作的计划性，使之更好地适应今后生产建设发展的需要。加强对培训学徒工作的领导，改进技工学校的教学工作，进一步提高后备技术工人的质量。此外，根据农业机械化工作加速进行的情况，还必须有计划地培养一大批农业机械工人和农业技术工人。这项工作在今年就应当更好地进行。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农业、工业等生产部门所需要的劳动力，同商业、服务业、文教卫生等非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物质生产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一切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物质



生产劳动服务的。非生产性劳动永远是需要的，在劳动力安排上必须占有适当的数量。但是，如果非生产性劳动占用劳动力过多，而物质生产劳动的劳动力却不足，那末，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必然要受到不利的影响。因此，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合理安排农业、工业等生产部门和商业、服务业、文教卫生等非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使物质生产部门经常保持足够的劳动力，非生产部门也保持一定比例的劳动力，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目前全党全民大力支援农业的情况下，商业、服务业和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必须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尽力做好支援农业的工作。

对于组织在城市人民公社中从事各项生产和服务工作的大批劳动力，也应当进一步地合理安排使用，改进劳动组织，提高技术和服务水平，使他们更好地为城市建设、国营企业和居民服务。

* * *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视劳动力的安排和节约，是发展生产力的一个重要问题。劳动的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马克思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①毛泽东同志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②我们发展生产，必须首先充分发挥人的革命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劳动力的作用。这就要求在安排生产建设的时候，把安排劳动力放在首要的地位，把各个时期必需的和可能运用的人力（包括干部、技术人才、一般劳动力等），根据生

产建设计划，统筹安排好。只有安排好人力，物力才能起作用。只有“人尽其才”，才能“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任何一个方面的建设，假定物力、财力等等安排得都好，但是对于人力安排得不好，计划是不可能圆满实现的。因此，那种只注意物力、财力而忽视人力的见物不见人的片面的思想，是不正确的；以为我国人口众多而疏忽大意，不重视劳动力的合理安排使用，不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是不正确的。

对劳动力分配使用的管理，必须采取集中领导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没有劳动力的集中统一管理，就没有劳动力的全面合理安排。具体说来，就是各方面劳动力的分配原则，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人数的安排计划和变动这种计划的决定权，必须按照一定的范围，集中在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三级。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劳动力的统一调度，合理使用，避免各自为政，浪费人力。这种劳动力的集中管理，又必须是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劳动力安排计划的制定或修改，应当自下而上地经过基层组织 and 群众的讨论，集中群众的智慧和意见，然后确定下来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集中管理的正确，才能够使各项节约劳动力的措施充分实现。劳动力安排计划一经确定之后，必须在集中管理和群众监督之下严格执行，一切按照计划办事，不允许有擅自超计划增加人员、私招乱用等现象。维护严格执行劳

①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7页。

② 《重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16页。



动力安排计划的纪律性，是保证这个计划以至生产建设计划完满实现的重要条件。

使用劳动力必须很好地保护劳动力。关心劳动者的生活是党的根本政策，是保护劳动力的最重要的措施。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群众的干劲越大，党越要关心群众生活。党越是关心群众生活，群众的干劲也会越大。”^① 我们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劳动报酬政策，注意了安排好群众的生活，加强了劳动保护工作，做到了安全生产，劳逸结合，这就更加促进了广大群众政治积极性的提高，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连续跃进。但是也应当指出，有少数单位在使用劳动力时，对群众

的积极性爱护得不够，劳逸安排得不好，以致使群众不能经常保有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劳动热情，这种现象是必须彻底纠正的。

全面安排和节约劳动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必须根据以往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丰富经验，更加自觉地认识和掌握运用这一方面的规律，做到使全国劳动力的分配使用更好地符合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①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页。

关于《宋定伯捉鬼》故事出处的一点说明

在一九六一年第三、四期《红旗》上发表的《〈不怕鬼的故事〉序》，其中说到一篇题作《宋定伯捉鬼》的故事“选自干宝的《搜神记》”。后来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序文，这几个字却改作“出自《列异传》”。对于这个改动，需要略为说明一下：

我们编《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时，《宋定伯捉鬼》的故事最初用的是今存二十卷本《搜神记》卷十六的文字。但今存二十卷本《搜神记》虽然题“晋干宝撰”，却并非干宝的原书，而是明朝人从前人书和其他书籍辑录而成。其中大部分故事有根据可查，但也有一小部分故事根据不明或并非《搜神记》文字。宋朝人编的类书《太平御览》卷八二八收有宋定伯捉鬼故事，说出自《搜神记》，但故事比较简单。另

外，唐朝人编纂的《法苑珠林》卷十（明万历刻本卷六）、宋朝人编的《太平广记》卷三二一和《太平御览》卷八八四也收有这个故事，都说出自《列异传》，而且故事都比较详细。《列异传》原书今已不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断定它是魏晋时人所作，成书当较《搜神记》为早。明朝人编的二十卷本《搜神记》中的宋定伯捉鬼故事，文字同《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又很不一样，反而同《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和《太平御览》卷八八四很相近，同《法苑珠林》尤为接近。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在《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最后定稿时，决心不用今存二十卷本的《搜神记》的文字，而改用《法苑珠林》的文字。我的序文也就相应地改为这篇故事出自《列异传》了。

何其芳 二月二十三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胜利的斗争

· 罗 士 高 ·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西南前哨，正在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进行着坚决顽强的斗争。

阿尔巴尼亚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解放，曾经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旧日的阿尔巴尼亚，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它受土耳其封建帝国的统治将近五百年，随后不断为希腊、意大利等外国侵略者所强占和掠夺。解放前，阿尔巴尼亚的封建主勾结外国资产阶级残暴地统治着人民。那时，除外国资本霸占的几处规模不大的矿场和油井外，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农业和畜牧业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文盲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全国没有一所高等学校。卫生医疗设施十分缺乏，各种疾病流行。阿尔巴尼亚人民为反对土耳其奴役者，在几百年中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斗争，出现过像斯坎德培这样卓越的民族英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阿尔巴尼亚人民展开争取独立的广泛斗争，给予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等国的占领者以有力的打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先后侵占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人民拿起武器，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一九四八年改名为阿尔巴尼

亚劳动党）成立，从此，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解放斗争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基本形势，确定了以反对外国占领者为主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路线，积极地组织和扩大人民武装，团结全国各阶层爱国力量组成民族解放阵线。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坚强领导下，阿尔巴尼亚人民同德意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苏联红军进军巴尔干的大力支援下，终于解放了自己的祖国，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从而使自己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解放后，阿尔巴尼亚人民彻底完成了民主改革，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开始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吸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本国具体情况，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工业方面，大力发展资源条件较好的石油、铬、铜、煤、沥青、铁、镍等采矿业和人民生活所迫切需要的食品、纺织等轻工业。在农业方面，通过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按照自愿原

* 斯坎德培在一四四三年曾领导人民起义，使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领土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一四四三年到一四六七年間，他又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胜利地击退了土耳其侵略者的进犯。



则，积极而又稳步地把农民組織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注意农牧兼顧，大力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开垦新地，推广农业机械化。在文化教育方面，积极扫除文盲，广泛培养工农知識分子，強調理論与实践相結合，学校与生活相結合，学习与劳动生产相結合。

现在，阿尔巴尼亚已經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拥有現代化工业与集体化农业的农业—工业国。在城市和农村都已經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一九六〇年，社会主义的經濟部門提供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国民收入，社会主义成分占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九、批发商业的全部、零售商业的百分之九十和农业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国民經濟的第二个五年計劃（一九五六到一九六〇年）的主要任务基本上都已提前完成。一九六〇年同—一九五五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八以上。一九六〇年不到十五天所生产的工业产品就相当于解放前一九三八年全年所生产的工业产品。农业合作化的主要任务已經完成，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以上，合作社和国营农場的耕地面积共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六以上。一九六〇年水利灌溉面积約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已达到平均每一百公頃作物面积有一台拖拉机（标准台）。一九六〇年和一九五五年相比，农作物面积扩大了百分之十三左右。第二个五年計劃期間农业总产值比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在工农业生产迅速增长的基础上，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第二个五年計劃期間，国民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九，商品流

通总额增加将近一倍。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在四十岁以下的居民中已扫除了文盲；普及了四年制义务教育，現正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并准备逐步过渡到八年制义务教育；创办了国立地拉那大学和其他高等学院；普遍設立了电影院、图书馆、文化宫、閱覽室等。本民族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得到了发揚，阿尔巴尼亚人民已經有了自己的歌舞剧院、話剧院、电影制片厂和自己的影片、歌剧作品等等。医疗机构网已經遍及全国各地。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这样光輝的成就，是經過了十分艰巨的斗争的。正如恩維尔·霍查同志所說的：“我国人民經歷的这条光荣道路并不是滿布鮮花的道路，而是一条滿布障碍的十分困难的道路。人民和党不得不在各个战綫上同战争带来的灾难和破坏，同飢餓和落后，同国外国内的敌人进行斗争。但是我們党和我国人民从未在无数的困难面前屈膝，从未害怕过敌人的进攻。我們战胜了困难和敌人，一直在向前进。我国曾是欧洲最貧穷的一个国家。帝国主义者、法西斯分子、豪紳、地主和商人們，吮吸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血，把他們弄到极端貧困的境地。剩余的东西也叫战争給毀了。一切都需重新建立。若是沒有牺牲和人民的英勇精神，若是沒有党的正确的果敢的領導，那什么也建設不成。”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中，曾經对城市和乡村的剝削階級——富农、資本家、投机商、高利貸者进行了尖銳的斗争，粉碎了他們的破坏活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貫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对劳动群众进行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影响，帮助劳动群众摆脱宗教偏见、迷信和有害的风俗习惯，树立新的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由于进行了深刻的社会改革，由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劳动人民的觉悟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坚如磐石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以高涨的热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高度警惕地保卫着祖国的独立和革命的胜利果实。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他们迫切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建设。阿尔巴尼亚一向坚持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争取同周围邻国建立和发展友好睦邻关系。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僕从希腊保皇政府和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把阿尔巴尼亚看作是眼中钉，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干涉和破坏活动。早在阿尔巴尼亚解放初期，美英帝国主义者就竭力纠集阿尔巴尼亚国内的反动派阴谋进行复辟，策动希腊反动派荒谬地提出对阿尔巴尼亚南部的领土要求，并在阿希边境频繁地进行武装挑衅。英国舰队在一九四六年曾公然侵入阿尔巴尼亚领海，进行登陆威胁。美帝国主义以及意大利、希腊等国的法西斯反动派庇护和训练从阿尔巴尼亚逃亡出去的战犯和叛徒，派遣他们潜返阿尔巴尼亚进行间谍、破坏活动。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特别凶恶的敌人，他们一心妄想并吞阿尔巴尼亚，把阿尔巴尼亚变为南斯拉夫的殖民地。在阿尔巴尼亚解放初期，铁托集团在对阿进行“经济援助”的幌子下，企图使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依附于南斯拉夫的经济，不让阿有独立发展的工业，只要阿生产南斯拉夫所需的一些原料。铁托集团力图利用当时的阿南计划协作委员

会作为控制阿经济命脉的机构，并把拟定的阿南合营企业变为他们单方面操纵的企业。铁托集团的阴谋活动还伸展到阿尔巴尼亚的军队当中。他们在阿军领导机构中收买了一些代理人，打击阿军的正确领导人，反对阿党在军事方面的正确路线，甚至要求把阿军并入南斯拉夫的军队。他们借口阿军力量薄弱，还企图把南斯拉夫军队开进阿尔巴尼亚驻扎，以实现武装占领阿尔巴尼亚的阴谋。当这一切阴谋都被粉碎以后，铁托集团继续采取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派遣间谍，造谣破坏，组织叛乱，进行频繁的边境挑衅等。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四年间，对阿边境挑衅即达四百次以上。单在一九五三年一年中，对阿派遣了一百二十个武装颠覆小组。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〇年，又曾陆续向阿派遣几百名特务匪徒。一九五六年铁托访问希腊时，甚至就南斯拉夫和希腊共同瓜分阿尔巴尼亚的问题同希腊国王进行过会谈。几个月以前，铁托集团和希腊反动派还曾勾结阿尔巴尼亚的叛徒，策划配合地中海的美国舰队进攻阿尔巴尼亚，妄图消灭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阿尔巴尼亚人民对敌人从来不抱任何幻想，在困难面前从来没有表现出恐惧和动摇。他们“对朋友用‘面包和盐’接待，而对敌人则以子弹射其脑袋”。阿尔巴尼亚人民坚决镇压了反革命叛逆，并且同伟大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兄弟国家的人民一起，彻底揭露并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所策划的一切阴谋和挑衅，钢铁般地保卫着自己祖国的主权和每一寸土地，以“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战斗精神，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坚持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国家紧密合作、互相帮助，坚决揭露和反对美帝国主义以及和平社会主义的所有其他敌人的阴谋活动，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的斗争。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这种坚定立场和英勇斗争，使阿尔巴尼亚成为社会主义阵营西南前哨的坚强守卫者，成为保卫巴尔干地区的和平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因而赢得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热爱和尊敬。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所有光辉成就，都是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恩维尔·霍查同志说得好：“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像座花岗岩的高岩，顶住了国外和国内的风浪。单这一件事（姑且不谈其他的事）就证明了我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证明了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路线的正确。”

以阿尔巴尼亚人民久经考验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诞生并锻炼出来的，是坚强的富于战斗性的党，是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党，是有高度原则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党一贯重视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遗余力地为肃清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剥削阶级的一切思想影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纯洁和巩固自己的队伍而斗争。解放初期，阿尔巴尼亚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阿尔巴尼亚贫困落后，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同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取消党的

领导，主张国家应当贷款帮助资产阶级和给地主保留大量土地。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们则主张乞求美英帝国主义的承认，接受它们的奴役性的贷款。一九五六年，当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特别猖獗的时候，党内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又从内部向党进攻。他们为那些被党和人民惩办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叛徒翻案，攻击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要求放棄阶级斗争，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代替党的正确路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这一切离开了党的路线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反党宗派集团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清除了那些坚持错误、不可救药的分子，从而不断地巩固和加强了自己队伍的团结一致。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各国兄弟党一起，对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有力地揭穿了铁托集团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丑恶面目，不断揭露了铁托集团阴谋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阻挠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破坏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等罪恶活动。最近，霍查同志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再一次表示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定立场。霍查同志说：“我们在勇敢地保卫和平、为和平共处的胜利、为揭穿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特别是在为反对人类主要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而进行斗争的同时，今后我们将同样勇敢地和坚决地反对为美帝国主



义的企图效劳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特别是反对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死敌、我国人民和党的自由和独立的顽固敌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这是曾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的我们党的路线,这又是我们的代表大会所一致决定的我们今后的路线;我们全党和这次代表大会所选举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像过去一样将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执行这个路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这种高度的革命原则精神和战斗精神,受到了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敬佩和爱戴,对于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以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国家遵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紧密地团结一致,相互援助和相互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竭力维护和加强同各兄弟国家首先是同伟大的苏联的这种团结和友谊。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斗争是对各兄弟国家的有力支持,各兄弟国家首先是苏联也给了阿尔巴尼亚人民以重大的援助。正如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声明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各国发展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它们获得成就和成绩的最重要的国际条件是:相互援助和相互支持,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一致的一切优越性。”“社会主义各国根据完全平等、互利和同志式相互援助的原则,使全面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合作日益完善,这既符合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又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家

庭中的亲密兄弟。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国家所共同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共同的斗争目标,把中阿两国人民紧密地牢不可破地联结在一起。中国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一向得到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全心全意的支持。中国人民也始终不渝地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英勇斗争。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互助合作关系正在不断巩固和发展。中阿两国人民,同其他兄弟国家的人民一起,将永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旗帜,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为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和建设社会主义而携手前进。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阿尔巴尼亚国民经济和文化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的宏伟纲领。在今后五年中,阿尔巴尼亚将进一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进一步发展消费品的生产。农业生产将以更大的步伐增长,更好地供应人民生活的需要和轻工业原料,增加出口。职工的实际工资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将有很大的提高。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也将有进一步的发展。阿尔巴尼亚将在从农业—工业国变成工业—农业国的道路上更加迅速地前进。一幅更加灿烂辉煌的图景正展现在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面前。久经战斗锻炼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周围,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团结一致,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必将排除任何困难,继续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調查研究的態度

· 关 鋒 ·

調查研究的態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正確的態度是做好調查研究的根本條件，只有抱著正確態度去做調查研究，才能真正了解情況，認清客觀規律，找出解決問題的正确方法。

怎樣的態度才是進行調查研究的正確態度呢？

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說，要有滿腔的熱忱、眼睛向下的決心，要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要老老實實，實事求是。這也就是說，要誠誠懇懇地十分虛心地向實際學習、向群眾學習。這是進行調查研究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態度，是共產黨員的党性表現。

毛澤東同志在說明他開調查會的方法時說道：調查會“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到會的“這些幹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①

請看，毛澤東同志是多麼虛心，多麼尊重客觀實際，多麼尊重群眾啊！

毛澤東同志屢次告誡我們：“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學習一點東西，必須從不自滿開始。”^②毛澤東同志的虛心態度，

是一個最好的榜樣。毛澤東同志具有關於中國現狀和歷史以及國際狀況等各方面的非常淵博的知識，他一貫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從而科學地制定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路線、策略、方針和各項基本政策。毛澤東同志之所以成為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傑出代表，成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是和他一貫地十分虛心分不開的。他在一九四一年寫的《農村調查》序言中說：“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這是和我自己對於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並非說我什麼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③

人們的知識水平和人們是否虛心的關係，常常是這樣的：越是真正具有淵博的知識的，就越感到自己懂得少；這種虛心的態

①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810頁。

②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版，第497頁。

③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811—812頁。



度、迫切求知的心情，正是由于他们具有渊博的知识，因而眼界广阔的原因。反之，那种自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却恰恰是只有一知半解；这种骄傲的态度、自满的心情，正是由于他们孤陋寡闻、知识浅薄，因而眼界极其狭窄的原因。越是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实质的，就越感到向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的迫切，这是因为他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观点、群众观点指导自己行动的原因。而只记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懂得它的精神实质，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观点、群众观点的，则必然不肯向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告诉我们：我们的理论和政策都是来源于实际而又符合实际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而最基本的实践就是广大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因此，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并以这种认识为指导去有效地改造世界，就必须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经常诚诚恳恳地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不肯向实际、向群众学习，是最大的骄傲；老老实实地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对于共产党员说来，是虚心的根本标志。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并且把调查研究的过程看作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切忌在深入了解某一事情以前、听取群众的意见以前，先有一个主观主义的“框框”。毛泽东同志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①。我们进行调查研

究工作，不要采取主观主义的态度，不要带着事先凭空想出的什么“框框”下去，而要如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那样，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去调查了解情况、研究问题。

采取客观的态度去做调查研究，就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也就是说，在客观事实面前要老老实实，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事情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这是尊重唯物主义、尊重实际的起码态度。

采取全面的态度去做调查研究，就是说，既要了解事情和问题的这一方面，又要了解事情和问题的另一方面。一切事物都有二重性；我们要了解事物的真相就必须全面地看清它的两个方面。例如，要了解伟大的成绩，也要了解工作中的缺点；要了解成功的经验，也要了解犯错误的教训；要了解工作的顺利条件，也要了解困难条件；要听取积极分子的意见，也要听取处于中间状态的群众和落后群众的意见；要了解现状，也要了解历史，要了解一件事情的本身，也要了解这件事情和其他事情的联系、和周围环境的联系……。这样，才能全面地了解情况。这里切忌先入为主，听到一个方面的情况就下判断，并且把它僵化起来，而拒绝听取和考虑跟它相反的另一方面的情况。

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就是说要深入到事物里面去了解它的各个方面及其内部联系。对事情的原委、来龙去脉，对问题的真相、性质及其关键所在，要穷根究底，调查得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版，第778—780页。



一清二楚，要有“打破沙鍋紋（問）到底”的精神；而不要粗枝大叶，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仅仅看到一点表面現象就做結論、下决心、动手处理工作、解決問題。

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进行調查研究，才是真正地尊重实际、真正虛心地向实际学习。这样子进行調查研究，才能周密地詳細地占有材料（而不是零碎不全的材料），經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結論。

向实际学习，最基本的就是向群众学习。不肯真正虛心地向群众学习的人，是不可能調查研究过程中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看問題的。

群众的創造、智慧和斗争經驗是一切正确理論和方法的源泉。领导者所以能够领导群众，就在于善于向群众学习，集中和提高他們的創造和斗争經驗；否則，任何聰明的人物，也不可能正确地解決問題，领导群众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毛澤东同志說：“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諸葛亮”，这就是說，群众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国人民中間，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众中間去，向群众学习，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来……。”^①毛澤东同志的著作，无一不是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总结了群众斗争經驗的結果。

大家知道，互助組这个組織形式，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起过极重大的作用。这种組織形式是誰发明的呢？从其源头上說来，是群众自己发明的。这种組織原来是有些地方的群众，为了解决生产

上的困难而自发建立的（有的地方叫互助社，有的地方叫变工队或耕田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澤东同志在江西根据地做了实地調查，总结了江西群众劳动互助的經驗，后来又在陝北根据地做了实地調查，总结了陝北群众劳动互助的經驗，把劳动互助的办法条理化，把互助組的性质概括为“建立在个体經濟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組織”^②，加以推广。这种組織形式，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于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培养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直接地起了重大作用，后来，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起了个体农业經濟向集体經濟过渡的桥梁作用。起了更重要的桥梁作用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是从总结互助組的經驗发展而来的。由互助組、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条适合我国情况、又稳妥又积极的改造小农經濟的道路，是毛澤东同志从群众的实践經驗中总结出来的。仅从这一个例子，我們可以体会到群众的偉大創造力，可以体会到领导者必須向群众学习、总结群众的經驗才能领导群众这个真理，可以体会到虛心地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的經驗是調查研究工作的灵魂。

是否虛心地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是一个党性問題。沒有虛心地向实际、向群众学习的态度，就是沒有坚强的党性，也就不能在实际行动中真正重視調查研究，更不

① 《組織起来》。《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956頁。

② 同上书，第954頁。



能做好調查研究工作。

在我党的历史上，那些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錯誤的人，都是不肯調查研究中国的实际，不肯向群众学习，他們自以为了不起，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了解，而单凭主观向群众发号施令。毛澤东同志尖锐地指出，他們的世界观是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对于那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教条主义錯誤的同志，毛澤东同志曾經批評道：他們“都凭主观，忽視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夸夸其談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譁众取寵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飞。这就是我們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导革命，則害了革命。”“是党性不純的一种表现。”^①当时为毛澤东同志所批評的那些人当中，有些人也跑过許多地方，会也开了，和干部談話也作了；但是，由于他們自以为是，不尊重客观实际，对群众驕傲，不肯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所以仍然是“欽差大臣”滿天飞。他們偶而揀到一点零星的片面的情况，就把它拿来作为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想法的“根据”，对于不符合他們的主观想法的情况就不肯看、不肯听，或者“視而不見”、“听而不聞”。他們从书本上記下的一些詞句，偶而揀到的一点零星材料，都是用来譁众取寵。毛澤东同志针对这种态度說：“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問，任何一点調皮都是不行的。”^②

我們必須时刻記住毛澤东同志批評“欽

差大臣”作风的这段話，并且經常引以为戒。如果没有坚定地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的决心，而沾染上“欽差大臣”的作风，就是跑到下边去，开了調查会，也学不到任何东西。如果你不虛心，群众就会感觉到你开調查会、和他“商量”不过是“走过場”，他就会“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就会只說那些你願意听的話，而不說另外的話。就是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你事前抱有脱离实际的主观成見，也是听不进去的。

做調查研究工作，要虛心地实际、向群众学习，当然这不是說，不要或者輕視指导思想；也不是說，简单地記取一条一条的个别事实或者群众說什么就是什么、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我們的指导思想，是馬克思列宁主义。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符合于客观实际的真理，是我們深入、正确認識客观事物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在調查研究中，虛心地实际、向群众学习，是要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指导，去辨別、分析、綜合、概括事实材料，集中和提高群众的經驗、意見，得出合乎客观規律的結論。这就是毛澤东同志所說的“实事求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

毛澤东同志說：“‘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內部联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

①②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820、821頁。



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做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领导者要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②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过程的学说和群众观点联系起来，把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的原理应用于认识过程，从而阐明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的辩证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这里，他也从认识论的高度，阐明了领导者必须向群众学习和怎样向群众学习的问题。

群众中总是有积极的、落后的和处于中间状态的这样三部分人，因此，在群众中会有不完全正确的和错误的意见。群众，包括积极分子在内，往往受着从局部看问题的限制，往往受着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较低的限制，因此，群众的正确意见或比较正确的意见，也会是零散的、无系统的、不完整的。所以领导者向群众学习，要采取“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方法。这就是，首先要虚心听取群众的各种各样的意见，然后对这些意见进行

分析、概括、总结，加以集中和提高，整理成有条理的系统的意见。这种学习就好像蜜蜂的采花酿蜜，而不是像蚂蚁那样的只是搜罗现成的食物。这样做，就能既是群众的好学生，又是群众的好先生。越是能够做群众的好学生，也就越能够做群众的好先生；越是群众的好先生，也就越能够做群众的好学生。

调查研究就是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过程，也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根据客观材料去“求是”也要依靠群众的智慧和经验，和群众虚心地讨论，和群众一道去“求是”。要做好这件事，必须紧紧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总路线为指导，又必须始终贯彻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的决心。

充分地了解情况，并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求出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总路线指导之下，抱着满腔热忱、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抱着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虚心态度，老老实实地去做调查研究，就一定会越来越清楚地摸透在各项工作中的客观规律，从而把党中央的各项政策贯彻执行得更好，工作任务完成得更好；我们的政治水平、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本领，也一定会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实践中得到更大的提高。

①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821页。

②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921页。



民主革命中的农民问题

林 一 舟

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要夺取国家政权，必须解决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必须深入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进行斗争，从而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著名的原理。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者来说，问题只在于，如何按照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不同的革命任务（民主革命的任务或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来解决这个问题；是自觉地对待这个问题，还是被迫地对待这个问题。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农民问题成为这个革命的最中心的问题。

旧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农业和手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约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据抗日战争以前统计）。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贫农和雇农又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就土地占有情况来说，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雇农、中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广

大农民群众，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因此，要埋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必须消灭封建主义这个敌人；也只有坚决领导农民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才能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群众不仅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力军。

这样，我们的任务就是如列宁所指出的，要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即以农民为主要群众，反对的不是一般资本，而是中世纪残余的条件下，把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这种条件下的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用独立的经验加以解决。

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时候起，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个任务，并完全自觉地把解决农民问题看作是处理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了农民的土地革命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把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领导起来。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起，已经在思想



上、干部上和实际工作上为解决这个任务进行了巨大的准备。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很强大的，他们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中国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党，最初是在城市中开始了战斗，组织并锻炼了本阶级的力量，接着也在农村中做了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工作，并且在一九二四年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英勇地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背信弃义地对中国人民进行突然的反革命袭击，把革命的人民抛入白色恐怖的血海中。中国人民被剥夺了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大批的革命家受到逮捕和杀戮。中国革命的种种特殊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中国革命斗争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取得胜利，而必须经过长期的和艰苦的斗争，方能逐步造成全国胜利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也就发生了。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①

这就是说，在中国革命的条件下，党的

工作不仅要一般地深入农村，而且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利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和反革命阵营内部不统一这样的条件，在农村建立强大的革命根据地，依靠这样的根据地，长期地积聚和锻炼革命的力量，坚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有人曾经怀疑，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是否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在革命历史上，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或者工人的斗争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而遭受挫折或失败，没有因农民革命势力的发展而不利于革命的。在中国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只有采取这个革命路线，才是真正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执行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否则，党就不能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

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自然不是说可以放棄城市工作，而是以农村为主，兼顾城市，以城市工作支援农村。

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这种军队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这种战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村根据地，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坚决为农民利益而斗争，从广大农民中间取得了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所需要的大量的人力、物资后备。这样，中国共产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29页。



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就成了民主革命时期我国工农联盟的主要形式；这也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全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主要斗争形式。

中国人民夺取国家政权，首先是在一片一片、一块一块的地区上夺取，由一块一块的地区，到小半个中国，再到半个中国，再到大半个中国，然后夺取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伟大的农民战争，在农村中建立起强大的革命阵地，并且逐步地波浪式地扩大这个阵地。农村革命阵地一块一块扩大的过程，就是反动的国家政权在一块一块的地区上被打掉、革命的政权在一块一块的地区上建立起来的过程。

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并采取这样的革命发展的道路，也就最有保障地解决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

无产阶级不能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孤军作战。中国革命的敌人既然是异常强大的，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按照各种不同的情况，从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和阶层，征集广大的同盟军。农民是无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因此，农民问题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同时包含着一个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问题。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应当领导农民，领导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应当领导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些可能联合的非劳动人民。在中国条件下，这个统一战线能否建立以及能否巩固，也要以解决农民问题的情况为转移。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遭受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排挤和压迫，因此有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的可能，但是，他们又有软弱性，有革命和反动的两面性，经常处于动摇的中间地位。无产阶级实现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意味着和他们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作不断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说：“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①这里所说群众的力量，主要地就是指工农联盟的力量，指无产阶级把农民的革命力量彻底发动起来；正确的政策，就是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所采取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正因为中国无产阶级依靠着强大的农村阵地，和广大农民群众建立了最密切的战斗的联盟，因此也就有可能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之上，解决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而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反过来又有利于农民的发动。这是中国革命所已经证明了的规律之一。

我党的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人从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事业中的地位、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有些人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处于被迫和盲目的状态。历史上党内所犯的右倾和“左”倾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不是主要地依靠

^①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66页。



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而是主要地依靠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对于资产阶级只进行联合，而不进行必要的斗争，一味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害怕农民斗争会吓跑了资产阶级，不但不支持、而且限制和反对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因而使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这样，一方面，他们不仅不能制止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叛变，反而为一九二七年夏季国民党的叛变和发动反人民战争，造成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把民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而是相反地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到了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毛泽东同志在回顾这次历史教训时指出：“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①在那次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投降主义分子又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匍伏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刺刀之下，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所谓“合法”活动，而把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诬蔑为“流寇运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也完全不了解农民问题、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他们急于夺取大城市，看不见中国革命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拒绝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拒绝在农村中进行积蓄力量的艰苦工作。他们把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诬蔑为“农

民特殊革命性”、“农民意识的地方主义和保守主义”等等。“左”倾机会主义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则只进行斗争，而不进行适当的联合，否认在民主革命中有争取或中立各种中间势力的必要和可能。这样，他们也就同样地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使无产阶级陷于孤军作战，使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后来，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左”倾机会主义者占据的党的领导机关（当时的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农村根据地。但是这种转变，对于他们说来，是被迫的，而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和在农民问题上达到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结果使根据地的工作受到破坏。

曾经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王明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又犯了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相类似的错误，他在实际上不承认党所领导的农民武装和农村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作用。

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不懂得农民问题对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不承认中国革命必须首先在农村中建立根据地，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而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们不懂得农民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地反对了这些右的和“左”的

^①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7页。



机会主义的錯誤。他在反右和反“左”的两条战綫的斗争中，保卫了并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問題和无产階級领导权的革命学說，由此逐渐提高了全党对农民問題的自觉性。

在农民問題上，毛澤东同志还批判了另一种錯誤意見，这种錯誤意見就是认为农民无需无产階級的領導，甚至把中国革命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解釋成农民的領導作用。事情恰恰相反，中国革命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条件下，按照无产階級的观点，領導农民革命的过程，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农民脱离无产階級领导的任何自发过程。在近代革命中，农民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他們不是接受无产階級的領導，就是接受资产階級的領導。农民誠然占人口的大多数，但是，如列宁所說：“小资产階級群众的大多数本身还没有决定过任何問題，而且也不可能决定任何問題”^①。农民只有在无产階級领导下，才能成为偉大的革命力量，也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无产階級先鋒队必須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为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和革命的农民同呼吸，共生死；同时，又必須在农民群众中进行艰苦的工作，用无产階級的思想来不断地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而不是使自己降低到小生产者的自发性的水平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階級的綱領和政策，无产階級的思想 and 紀律性，来教育和引导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使他們在思想上、組織上受到了严格的鍛炼，并避免了农民在小生产条件下形成的狹隘观点（散漫、非組織

观点、个人主义、絕對平均主义、缺乏远大眼光等等）对于党的政策的影响，从而实现了无产階級的領導，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二

解决农民土地問題，把社会生产力从封建关系束縛中解放出来，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中国各階級各阶层对于这个革命的态度，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們对于农民土地問題的态度。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階級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是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土地問題的。他們有时声言要解决土地問題，只是一种欺騙，他們是以这作为殘酷进攻农民的烟幕。

中国民族资产階級的政党沒有、也不可能有坚决的土地綱領。就市場需要來說，这个階級也贊成土地改革，但他們又多半和封建的土地关系联系着，并且害怕民众，因此，他們中的許多人又害怕土地改革，害怕农民的真正觉醒；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右翼分子，他們是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尽管他們在口头上有时也喊着“解决土地問題”的口号，但目的只是为了欺騙农民。这种情况，“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評同盟者、揭破假革命、爭取領導权的責任。”^②

在中国，只有无产階級才能够坚决領導农民彻底解决土地問題。中国革命的經驗指出这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只有制訂和执行

① 《論立宪幻想》。《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1頁。

② 《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43頁。



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成为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土地纲领是最彻底革命的，这就是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没收地主的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统一平均分配，以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贫农和雇农，无地或少地，他们过着世界上少见的贫困的生活。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虽少，但半无产阶级却是极其广大的，他们并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具有很大的革命性。这是中国革命中（不论是民主革命中或社会主义革命中）长期起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农村革命的主力。右倾机会主义者或者“左”倾机会主义者，忽视了这种情况，他们看不到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和革命毅力，由于这样，他们也就不懂得不能把中国农民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比较保守的农民相提并论。

由于贫农雇农所处的经济地位，他们对土地斗争的态度最坚决。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必须和只能是贫雇农。土地改

革的主要的直接的任务，或者说，民主革命中解放社会生产力的主要的任务，也就是满足广大数量的贫雇农群众的土地要求。在农村中组织包括贫雇农中农在内的最广泛群众性的农会，首先组织包括贫雇农群众的贫农团，使贫农团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这是坚决而彻底地进行土地改革的最重要的保证。同时，在土地斗争中及其他一切斗争中，把广大贫农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纪律性逐步提高到接近革命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之成为党的力量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取之不竭的泉源，这又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的保证。

毛泽东同志屡次强调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必须贯彻执行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必须反对错误地扩大打击面。

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农。中农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说：“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①。“土地改革必须团结中农，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不这样做，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②要团结中农，一方面必须率领中农向封建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中农也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并在政治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38页。

②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2页。



上处于无权的地位)，并取得胜利，以停止中农的动摇；另一方面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切实地保护中农利益，使之不受侵犯。土地改革中，也要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此外，还要给中农以政治教育。毛泽东同志对中农这个阶层做了杰出的分析，他特别把中农中接近于贫农的下中农和富裕中农区别出来。对于富裕中农，规定其与富农的严格界限，不能损害富裕中农的利益，从而保证巩固地团结了全部中农；对于下中农，则分给一部分土地，并吸收他们协助贫农团工作，参加农村政权工作，借以进一步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扩大贫农的优势。

在土地改革中，在组织农民革命队伍中，有两条完全相反的方针，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组织农民群众的力量，以进行斗争，“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①这就是坚决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发动农民自己救自己、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地、保卫土地的群众路线方针。这个方针反对单纯自上而下地“和平地”分配土地。这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与此相反，按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则是反对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单纯地自上而下采取所谓“和平方式”，由政府把土地“恩赐”给农民。

土地改革是一场极尖锐的阶级斗争，是

我国多少世代以来呻吟于封建压迫下的农民翻身起来的严重斗争。毛泽东同志一直反复地向我们阐明这个真理：土地改革是农民群众的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对群众的领导和帮助。获得土地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事情成败的关键。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而“恩赐”土地，单纯地自上而下进行所谓“和平”土改，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如果是这样做，今天把土地分给了农民，明天地主阶级就可能用各种方法进行反攻和复辟。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农村中进行巨大的工作，以启发农民的觉悟和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党和政府派遣工作组到农村去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去代替农民群众进行斗争，而是深入农民群众中间，访贫问苦，宣传政策，发现贫苦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以他们为骨干，帮助农民组织起农会，将政策交给群众，有领导地开展斗争。划分农村阶级，是一项极复杂的需要精细地进行的工作，但农民群众在有了斗争的觉悟，掌握了土地改革的政策时，能够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人民政府在土地改革期间则组成人民法庭以支持农民的斗争。总之，只有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用农民自己的力量从地主阶级手里夺取土地，打倒地主的势力，劳动农民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的主人。

正因为土地改革斗争是依靠农民群众的觉醒和他们自己的力量而进行的，所以经过这种斗争，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也就能够进

^①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78页。



一步地提高。广大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深切地认识到，本地的地主势力同整个反动势力是相关联的，自己的命运是同整个革命、整个国家的命运相关联的。这样，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通过土地改革，不但把以贫农为骨干的广大农民组织成一支积极从事生产支援前线的生产大军，而且迅速地把他们组织成一支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的政治大军。党的这个方针，一直继续贯彻执行到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的土地改革中。

我国的土地改革，不是实行土地国有化，而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归农民所私有。这是适合于我国的历史条件和农民的愿望的。

划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的界限，区别封建性的东西和自由资本主义性的东西，将打击面严格限制在真正封建剥削的范围内，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①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也曾特别指出：“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有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②十年内战的后期，“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执行反对中间阶级并打击中农的错误政策，结果只

是造成了混乱，陷革命于不利。

中国土地改革中的富农问题，是中国具体的历史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个特殊问题。富农，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约占百分之五，富农经济在全国农业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民主革命时期，容许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但是，中国的旧式富农，一般具有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的性质，在这一点上不同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富农。在土地改革中，也必须废除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着更多地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以发动广大农民支持革命战争，那时颁布的《土地法大纲》，规定在土地改革中实行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分给农民的政策；这样做，是由于富农在当时革命和反革命的残酷斗争中，还不相信人民能够胜利，他们还倾向于地主阶级和蒋介石一边，反对土地改革和人民革命战争。但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又把旧式富农和新式富农（在民主政权下生长起来的）加以区别，对于新式富农，按富裕中农待遇。到了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反革命统治被推翻以后，我们就有了可能采取使富农在土地改革中保持中立的政策。一九五〇年公布的《土地改革法》，规定对富农只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对富农的其他土地和财产则一般不动。经过土地改革，富农原来所兼有的封建剥削是消灭了，但富农经济仍允许其存在。实行这样的

①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2页。

②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3页。



政策，就彻底地孤立了在农村人口中不足百分之五的地主阶级，便于我们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同时，也解除了中农群众的某些顾虑，能够更好地团结他们进行土地改革和发展农业生产。

“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这种政策也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说：“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① 实行按乡村全部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就有助于安定社会秩序，使地主和旧富农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长期劳动中获得改造。

必须坚决、彻底、全部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不要惧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毛泽东同志同时又强调指出，必须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所谓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就是说，必须分别地主和富农，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分别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分子和非恶霸分子，在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制度的大原则下面，不是一律地而是有所分别地决定和实行给予这些不同情况的人们以不同的待遇。”^② 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不仅使人们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且有利于减少革命的阻力，有利于分化和各个击败敌人。

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应当是有步骤的，即是说，有策略的。必须依据环境所许可的情况，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

和组织程度，决定发动斗争的策略，不要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的封建剥削制度。”^③ 在土地改革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特别着重地说明，对于各地区，各阶级、阶层的情况，要进行调查研究，要有基本的分析，然后依照实际情况决定方针，分地区、分阶段地开展工作，而不可无根据地、主观主义地决定问题，不可不顾农民觉悟程度而强制行事。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过去时期土地改革的经验，指出：在一切新解放区，必须把减租减息作为工作的第一个阶段、必经的预备阶段，在这个阶段，实行中立富农和中立中小地主的策略，将打击面缩小到只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和打击豪绅恶霸分子，然后，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提高了的情况，逐步地发展到平分土地的阶段，即消灭全部封建制度的阶段。

中国革命是长期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互相联结和互相推移，情况很复杂。在消灭封建制度的策略步骤方面，毛泽东同志一直主张适应于各个时期的斗争形势和任务，灵活地规定党的斗争策略。

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土地革命斗争经过了四个时期：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全国胜利以后的时期。各个时期的情况是不同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坚决地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斗争，复兴了并向前

①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2—1313页。

② 同上书，第1313—1314页。

③ 同上书，第1313页。



推进了革命运动，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个时期的土地政策，就是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为着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减少地主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并团结一切当时能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们起见，中国共产党将十年内战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合理负担的政策等。这就是在经济上逐步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立即消灭封建势力。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适应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发动农民群众积极支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又及时作出了改变土地政策的决定，即由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这种改变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即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这两年内，解放区农民除在物质生产方面给战争以巨大支援以外，大约有一百六十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青年农民自愿地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这样，我们终于在党的领导下，主要依靠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发动起来的农民力量，在中国的伟大的土地上，最后地埋葬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恶统治。

三

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为了获得政权，必须取得农民的支持。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后所屡次指出的，无产阶级只要一提出国家政权问题，或者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只要

稍为认真地提出革命的问题，就不能不提出农民问题，不能不提出与广大劳动农民结成坚固联盟、并使自己成为这个联盟的领导者的问题，否则，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国家政权，取得了，也不可能巩固地保持住自己的政权。而农民群众要获得真正的彻底的解放，只有在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的帮助之下，才有可能，才有保障。如果没有这个政权，一切已经取得的革命胜利果实，也可能会重新失掉。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农村中建立了革命政权。这个政权，在整个民主革命期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革命的政权。这个政权在一片一片、一块一块的地区上逐步向前发展，农民的土地问题也在一片一片、一块一块的地区上逐步获得解决或部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又加强了这个政权的基础，成了这个政权能够存在、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由于在人民政权领导下农民土地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由于农民在民主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获得了现实的利益，并且由于农民在共产党的教育下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越来越认识到政权的重要性，这样，农民群众就能够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更加自觉地坚决地为革命的基本目标——夺取国家政权而战斗。

毛泽东同志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



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①

中国无产阶级夺得了全国政权，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而后夺取城市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民主革命当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已经过去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但是，旧的历史阶段所遗留下来的民主革命任务，主要是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任务，还必须继续彻底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立即首先在广大农村地区，用三年时间进行了土地改革。在这次全国规模的土地改革中，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并免除了每年所缴纳的相当于三千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还分得了大量的农具、牲口等等。这样，我们就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在前一个革命中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伟大事业——工农联盟的事业。

这正说明：我们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方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

列宁曾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前一个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个革命；后一个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个革命的问题，巩固前一个革命的事业。

不论是在全国解放以前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或在全国解放以后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都无例外地大量地建立了各种互助合作组织。这种互助合作组织，在

民主革命条件下，只能建筑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之上，但它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农业生产，支持革命战争，对于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起了重大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这种互助合作组织更起着一种特殊重要的社会作用，它使得农村中的前一个革命易于转变为后一个革命；并且从这里开始，进一步把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巩固起来的工农联盟，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地为这个联盟奠定另一个新的更加巩固的基础，即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条件下，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紧紧地把握住农民问题，并以农民问题为出发点和中心来解决中国民主革命问题的全部历史经验，具有伟大意义。目前，我们已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新的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党的路线和政策，在现在和过去是有原则区别的。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国家，巩固和发展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发展农业生产，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极端重要的问题。就这方面来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领导农民斗争、解决农民问题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就仍是最切近的参考，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依然有很大的意义。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5页。

